



■1984年，鄧小平站在國貿大廈上俯瞰深圳市容。中間施工中的是國貿大廈。



■2012年，習近平在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考察。

中國漸進式改革36年

贏革命性變化

習式全面改革300天 豐富「漸進」邏輯

隨着習近平領導的全面改革實施已達300天，中國已經邁入歷史性變革的新時區。縱觀36年改革歷程，中國漸進式的改革，取得了堪稱革命性的變化，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循序漸進已成為中國執政黨推進改革的不二法門，是中國長期發展、漸次改進、內生性演化的必然選擇。當前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全面改革，正蹄疾步穩，有序推进，不斷以新的突破續寫和豐富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歷史邏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縱觀30多年的經濟改革歷程，梳理體制演進的重要節點，每一步改革的背後，都記錄着計劃管制與市場配置的此消彼長，見證着姓「社」還是姓「資」等各式爭論中的彷徨與解放，正是在觀念碰撞和利益調整的不斷接力中，中國一步步走出計劃經濟的沼澤，邁進了市場經濟的大道。

十一屆三中 啟改革開放大門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農村改革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令農業煥然一新。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變了十二大「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對於這「主」與「輔」的變化，鄧小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參與這份文件起草的著名經濟學家高尚全說，這份《決定》來之不易，是解放思想的結果，為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了道路。

十四大 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面對複雜的形勢，改革陷入「市場經濟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時更加明確地指出，計劃與市場，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鄧小平的講話從思想上衝破了多年的束縛，為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年後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系統地勾勒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大大推進了一步。曾被視為「與資本主義相關聯」的「資本市場」、「有違社會主義原則」的「勞動力市場」等「敏感詞彙」寫入這次《決定》，改革進程背後一個個觀念的突破可見一斑。

十六大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經過十年的發展，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明確提出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專家認為，經歷股份制姓「公」姓「私」的爭論，1997年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2002年十六大提出，「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進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而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深化了對公有制實現形式的認知，是在一系列觀念漸進變化後的又一次創新。同時，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曾長期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在十五大被提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十六屆三中全會，被進一步明確為「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參與這次全會《決定》起草的高尚全透露，原來在「重要力量」後面還有「和生力軍」四個字，鑒於非公有制經濟在有些領域已經成為主力軍了，例如就業問題，五分之四是靠非公有制經濟解決的，最後就把「和生力軍」刪掉了。這一細節無疑折射出了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個新里程。

十八屆三中 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歷史行進至2013年，中國改革處於深水區和攻

堅期。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這一表述是執政黨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新飛躍。十四屆三中全會指出「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在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相關表述中，「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被刪掉，改為「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市場配置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改變，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看來，體現了中央以更大決心和魄力推動政府向市場放權，理順政府和市場關係，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新突破。

改革30多年 經濟躍居全球第二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中國經濟改革以漸進的方式，贏得了革命性的變化。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張維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超過西方七國中的6個國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他認為，中國給世界帶來的震撼，得益於中國選擇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漸進改革之路。

「漸進式改革戰略，在保證原有利利益格局不受到急劇性衝擊的前提下，使市場制度能夠以『邊際演進』的方式獲得生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樹成說。中國的學者們認為，「漸進式」改革最大的優勢就是避免矛盾的集中顯現，最大程度地贏得理解和支持，避免社會動盪，保持政局穩定，同時又可以在緩步推進的過程中反覆完善。

當然，漸進式改革並非沒有短板。專家指出，經過30多年的改革，容易改的都改了，留下了硬骨頭，當前中國改革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經濟、社會、政治等多領域的轉型和改革交織融合，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已別無選擇。

展望未來 全面改革敢啃硬骨頭

去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習近平領導的全面深化改革已推進300餘天。綜觀全面改革路線圖，可以看出，立足中國國情，以問題為導向，從實際出發，始終是改革的立足點。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評論認為，習近平所主張的全面深化改革，並沒有脫離改革開放30多年來循序漸進的做法，也比較符合中國當前所處的實際條件。新一輪改革是中國漸進發展、內生性演化的必然階段。

中國智囊認為，習近平領導的漸進式改革，絕非瞻前顧後的保守改革，絕非局部領域的「小修小補」，而是「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瘡痼疾開刀」。中央深改組自成立以來已召開四次會議，從文化、司法、社會、財稅、戶籍、考試招生等改革的醞釀或出台，到央企負責人薪酬的調整以及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從《關於上半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進展情況的報告》的提交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重要改革舉措實施規劃（2014—2020年）》的出籠，每項改革舉措都設定了改革路徑、成果形式、時間進度，一場場改革「殲滅戰」步步為營，一系列措施「組合拳」頻頻發力。

專家認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穩步推進，旨在積小勝為大勝，以量變求質變，不斷為治本贏得時間、創造空間，待條件成熟時，實現關鍵環節的攻堅，重要節點的闖關，以階段性成功突進的強音奏出中國漸進式改革新的凱歌。可以期待，在未來七年內，習近平領導的全面改革，必將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演進注入新的張力和推力，以新的突破續寫和豐富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歷史邏輯。

之前進行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準備工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起到了解放思想、為改革培育土壤的作用。這些都是中國改革留下的成功經驗。

「當時我曾經極力勸說俄羅斯政府效仿中國經濟改革，不要採納西方建議的休克療法」，曾在莫斯科工作多年的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羅思義說。他毫不吝惜對中國改革的讚美，「20世紀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不是凱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的鄧小平。從實際結果來看，自鄧小平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表現遠遠超過世界歷史上的任何其他國家。」

港民主政制建設應走漸進之路

有學者做過這樣的統計：從1840年到1978年的近140年間，為了救亡圖存乃至民族復興，中國上演過一次次激進的改革，慘烈的革命，最長的太平時間不超過9年。而1978年至今的36年改革開放，不僅令中國第一次打破了這個時間怪圈，更讓全世界真正見證了一個國家的崛起，「中國離民族復興的夢想，從未如此接近」。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是什麼？答案可能有很多，但總繞不開四個字：循序漸進。

照搬別國必水土不服

循序漸進改革的成功，離不開對中國國情的理性認知，歸功於從實際出發的務實精神。幾千年歷史的文化傳承和觀念慣性，十億級人口規模的利益需求，總體落後且千差萬別的發展起點……中國的這些國情條件，使改革路徑的最佳選擇只能是審慎積極，循序漸進。中國的改革當然不排斥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但人類文明成果的借鑒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以解決現實問題為導向。環顧與改革開放同時代的其他變革，無論是激進的市場化休克療法，還是第三世界的「顏色革命」，照搬來的制度大多水土不服，最後由當地民眾為經濟下滑、社會動盪埋單。這些激進改革的教訓更堅定了中國循序漸進的改革取向。

習近平說：「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在循序漸進的改革實踐基礎上，中國執政黨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句政治口號，更是一種自然形成、不斷發展、逐步完善的制度。它之所以行之有效，充滿生機活力，就因為它是從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

政改離不開祖國土壤

「一國兩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舉，寄托着香港民主夢想的香港政制改革也離不開其根植的中國土壤，不可能一蹴而就。香港的民主政制建設，也應走漸進式發展之路。香港若能如期推進「一人一票」普選，則僅用十幾年，已是一大進步。

事實上，回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民主演進，「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都經歷了上百年的漸進過程。英國從光榮革命到全民普選，歷經300多年的緩進變革；美國制憲100多年後，黑人和婦女才陸續擁有選舉權。法國雖以數年大革命之力摧毀了舊制度，最終仍需約150年的反覆震盪，才逐步走完自己的普選之路。

因此，循序漸進呈現的是在特定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下長期發展、漸次改進、內生性演化的過程。成功的改革，不是橫空出世的，不是外來輸入的，不是生搬硬套的，也不是異想天開的。從這層意義上講，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說得有理：「一切制度都是生成的。」

文匯觀察

政治漸進變革 探索中國道路

從一元領導到多元治理

一些西方學者往往按照多黨制、全民普選和三權分立的標準，來衡量改革時期中國的政治發展，認為中國的改革主要是經濟改革，政治體制基本沒有變化。而在著名政治學者、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看來，「這是一種偏見和誤解」。他指出，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就是中共發動的一場政治改革。這次歷史性的會議，調整了中共的權力結構，重新確立黨內的政治路線和工作重心。政治體制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在中國要比在西方國家大得多。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不可能有隨後的經濟體制的改革。而隨着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中國的政治體制也在進行着深刻的改革。

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

在政府治理上，從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治理主體屬於「黨的一元化領導」，到20世紀80年代，中央決定實行政社分開和政企分開，黨和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城鎮企業和農村經濟事務。20世紀80年代後期先後推行的農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專家認為，這既是中國基層民主的突破性發展，也是國家向社會分權的重要步驟。20世紀90年代開始，新一輪的政府機構改革後，一些政府機構改造為行業協會，如輕工業部變為輕工總會，紡織工業部變為紡織總會，相應地，一些原來的政府管理職能開始移交給行業管理組織。90年代後期和21世紀開始，民間組織大量出現，政府開始強調其社會管理職能，並且開始讓各種民間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如今，中國已形成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各類企業事業單位和各種民間組織為主體的多元治理格局。

從人治到全面推進法治

從人治到法治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的重要變化。1979年中央首次在文件中使用「法治」概念，上世紀80年代中共有領導人強調執政黨必須在法律框架內活動，1997年中共十五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載入憲法，從而使「依法治國」從黨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十六大後中國政府進一步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國家的目標更加具體化。直到2011年中國政府宣佈已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將依法治國方略提到了一個更新的高度。此後，薄熙來案被公開審理、徐才厚和周永康先後被調查，成為中國依法治國進程的一系列標誌性事件。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專門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這在中共歷史上尚屬首次，顯示中國法治進入新的階段。

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

在發展民主方面，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動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進步。20世紀70年代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地方政府得以恢復，並開始行使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力。20世紀80年代，縣級以下人民代表開始直接選舉；中共開始廢除實際上的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並開始試行幹部任期制和黨代會常任制；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逐漸推行。20世紀90年代，中國共產黨開始試行黨員權利保障條例；鄉鎮黨政領導的公推公選開始試點；保護人權的條款進入《憲法》。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共產黨開始試行黨內監督條例，普遍推行重大事務的黨委票決制；黨政領導幹部競爭上崗制度在更大範圍內推廣；《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通過並實施；普遍實行重大立法和政策的聽證制度；開始推行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俞可平指出，經過30多年的努力，中國共產黨逐漸確立了中國式民主的根本目標、理想狀態、主要形式、重點內容和現實道路。

改革成就享譽國際 打破西方價值霸權

很多外國專家認為，符合中國國情的漸進式改革，是中國取得重大經濟成就的成功經驗。「中國徹底打翻了『只有民主和多黨制才能帶來經濟繁榮』的西方價值觀」，克羅地亞地緣政治學家亞斯娜·普雷夫尼克博士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進程保持了相當好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充分體現。

社會穩定保發展

普雷夫尼克認為，中國式改革最令人欣賞和稱讚的是，先在小的局部領域或者地區進行試點，通過實踐積累足夠的經驗後，再根據實際效果和社會需要，不斷深化和擴大改革範圍。「這種漸進式改革的

最大優點是能夠保持社會穩定，而穩定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上世紀90年代初，擁有十分相似經濟結構的中國與東歐多國都處於改革的十字路口。然而，採用漸進式改革的中國如今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東歐多國仍在經濟泥沼中艱難前行。俄羅斯專家對此感受更加深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米哈伊爾·季塔連科坦言，中國所有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都以特殊國情為基礎，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改革，不像俄羅斯照搬西方經濟教條。

在季塔連科看來，中國漸進式改革保證了理論上的全面性和實踐的實驗性能夠結合在一起。此外，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